

梁啓超 著

饮冰室書話

周嵐 常弘 編

时代文艺出版社

290748

梁啓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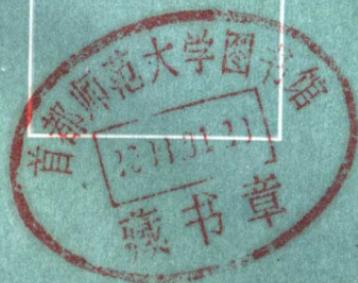
G256.4/14

飲冰室一書

周嵐

常弘

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82121

時代文藝出版社

饮冰室书话

作 者:周岚 常弘 编选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王兴吉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七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19.5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书 号:ISBN 7-5387-1157-0/I · 1108

定 价:23.50 元

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李玉铭

《饮冰室书话》、《饮冰室诗话》与读者见面了。按道理讲，作为编选者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两话”毕竟是大师之作，不容编选者置喙。而我们兴犹未尽，所以“编辑缘起”之类的话，包括我们对梁启超其人其文的看法，只好放在“两话”之外来说，以免有唐突前贤之嫌。

—

梁启超是一本大书。读梁启超不易。

他以吐纳古今的恢宏，剪裁春秋的博大，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

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多有建树，写下了一系列耸动视听、影响深远的好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是清末民初，尤其是1903年前后，中国舆论界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梁启超称赞王安石的文章，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昌黎而外，一人而已。其实，一人而外还有一人，即梁启超。他的文章也有如此气象！至少他向往这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大气象。

清末诗人黄遵宪曾这样评价梁启超：“《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又说，“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黄遵宪不仅以诗名世，而且为光绪举人，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能为他顶礼膜拜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他在这里如此称誉梁启超，说明梁启超在当时知识界地位之显赫。在晚清文坛上，严复是自信而傲视一切的，但他在和梁启超诘难中，也不得不承认其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梁启超“主暗杀则人因之而惘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当严复论及其文时说，“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敢为非常可喜之论”。又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胡适在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恰是翩翩少年，他后来回忆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梁氏《新民丛报》时代的文章，青年学者竟喜之，谓之“新民

体”；老辈文人则痛恨，将之诋为“文妖”、“野狐”。不难推断，梁启超的言论在 20 世纪初起着反传统，思未来，冲决罗网的“洪水猛兽”般的功用，是一大批初涉尘世又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学子“智慧的源泉”。似乎可以移用清代文学家赵翼论苏轼诗的八个字来评价梁文：“大放厥词，别开生面。”由此也可知道它的颠倒的力量了！

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的实际情况，可证曹氏所评不虚，言而有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对一代伟人、诗文书法大家毛泽东的影响。据《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载，在“五·四”之前的 20 多年中，梁启超曾是他心目中的伟人。梁启超号“任公”，青年毛泽东即取名“子任”。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他看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读了又读，有的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今天韶山纪念馆还藏有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部分《新民丛报》。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杨昌济先生常以梁启超的文章教导他。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梁启超的政治追求、道德文章都是第一流的。他惯称“梁康”，而不是大家习惯所称的“康梁”。1918 年，毛泽东组织的学生社团取名“新民学会”，很难说没有《新民丛报》的影子。毛泽东对斯诺讲，直到“五·四”之后，陈独秀和胡适才“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这表明，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千千万万个进步青年当中，梁启超还是有魅力的。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许多名人和伟人，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二

有的外国学者有这样一种观点：梁启超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此话不无道理。

梁启超同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样，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他参与领导戊戌变法，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先是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联合，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年8月组织宪法研究会。1917年7月，张勋复辟垮台后，梁启超又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宣扬儒家学说，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他想干的事几乎没有一件是成功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不少论者注意到梁启超“流质易变”，有的将其一生概括为“七变”、“八变”，也有的概括为“十变”。变是肯定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终其一生，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宗旨始终未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这也许是他的悲剧，但悲剧人物往往更动人心弦。

政治上如此，那么，在学术文化方面情况又如何呢？梁启超从告别官场到离开人间不过短短的10年，然而正是这10年，成就了他的学术大业，成为他学术上的灿灿发皇期。尽管政治家梁启超和学问家梁启超是同一个人，但就对后世影响而言，学问家梁启超却远远超过了政治家梁启超。他在政治上画地为牢，起点即终点。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以史学为轴心，广收博取，文、史、哲齐头并进，新论迭出，卓然成家，每每为后人称道。

《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学术名著和名文，今天读来仍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的确具有雄鸡一唱，呼唤黎明的效应。未必成功的政治家梁启超，却不愧为成功的学问家。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家梁启超也许会渐渐被人们淡忘，但学问家梁启超留给我们的那些纵论古今中外、探求人生社会的优秀著作却永远不会被忘记。它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必将继续流传下去，而这正是梁启超的价值所在。

梁启超文章堪称“国首”，研究堪称“国学”。他天赋甚高，才华横溢，写起文章来文思泉涌，笔不停挥，平均每天五、六千字。他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洋洋十五万言，仅用一周时间；《戴东原先生传》，一昼夜而成；《戴东原哲学》则是接连34小时不睡觉赶出来的。古人往往以“万言书”为稀罕之举，梁氏则无书不万言。他的文章很像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又像背水作阵，“驱市人而战”。对梁启超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手中无笔，眼前无书。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无异于让他过“老太爷的生活”，使他变成“废人”，而他“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从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的第一声啼哭，到完成最后一部著作《辛稼轩年谱》，于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56年！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年龄段的人尚属“中青年干部”。可惜这位正值盛年的广东新会才子、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带着他的未竟之业，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梁启超有一句座右铭：“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晚年在清华、燕京讲学，至病笃仍不忘著述，活活累死在学者的岗位上。可谓身验斯言！

梁启超逝世后，对这位曾立志称量天下的人物，言人人殊。杨度在所送挽联中如是说：“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夏敬观挽联云：“赋命历艰危，才性不为平世士；阖棺论成败，功名唯在旧书堆。”我比较喜欢杨度一联，也喜欢夏氏的下半联。杨联论人论事，平实近真，通达圆熟，颇见性灵。如“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说得多好啊！夏联将梁氏功名归结为杜门著述、整理国故，可谓不易之论。历史总是有遗憾的。人们对戊戌风流、民国入阁的政治家梁启超不无微词，而对博大但不够精深的学问家梁启超则怀着深深的敬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梁启超亦复如此。

三

说到梁启超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不能不谈到他倡导的“诗界革命”。不过，“诗界革命”的速度和步伐实际是两种：有前进，也有后退。

梁启超热情宣传的“诗界革命”的具体内容，其实就是《饮冰室诗话》所强调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者说“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1900年，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就“诗界革命”的方向又提出要兼备三长：一为“新意境”，二为“新语句”，三为“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也可将其概括为“三新一旧”，即新意境、新语句、新理想与旧风格。按照这一标准，他对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的诗，都有不同程度的推重和赞许。如称赞“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黄遵宪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者”；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第一巨子”；夏曾佑、蒋观云、黄遵宪为“近世诗家三杰”，等等。实事求是讲，在“诗界革命”口号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反映民族危亡、呼吁变法图存的诗歌作品，有的诗人在诗歌创新方面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功不可没。但这既是前进，又是后退。“诗界革命”的实际成果并不像梁启超所估计的那么大，甚至大到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的程度。

其一，“诗界革命”雷声大雨点小，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都没有留下足以令世人自豪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不是新派诗人无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提供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条件。黄遵宪在清季独树一帜，揭橥“我手写我口”五个大字，主张言文一致，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今别离》、《出军歌》、《军中歌》被梁启超推许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黄遵宪本人始终讳言“革命”，而且他对“新派诗”的解说和梁启超“诗界革命”的标准也大有出入。

其二，在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同时，以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和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还有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以及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以传统风格抒写旧式文人情怀的诗歌，其成就和影响要比新派诗人大得多。

其三，梁启超的诗歌创作和他倡导的“诗界革命”相始终，既是前进，同时也意味着倒退。诗歌创作非其所长，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如《太平洋遇雨》：“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此诗作于1899年梁氏亡命海外时，但不仅毫无沮丧之意，反而从这些激越澎

湃、笔挟风雷的诗句中透露出一股英雄气，不愧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可惜后来梁启超的诗歌渐渐走上复古道路，他也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如《腊不尽二日遣怀》写道：“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怨，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庚戌岁暮感怀》之六云：“入骨酸风尽日吹，那堪念乱更伤离。九州无地容伸脚，一盏和花且祭诗。运化细推知有味，痴顽未卖漫从时。劳人歌哭为昏晓，明镜明朝知我谁。”满纸颓唐抑郁，饱含沧桑之感，诗的攻击力和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1924年，夫人李蕙仙不幸病故后，诗人怀着丧妻之痛，强打精神，苦中寻乐，集宋词联，玩起了与“诗界革命”无关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如他最得意的赠徐志摩一联：“临河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全联六句话，分别出自六位诗人的六首词。这类“小玩意儿”，虽属游戏余事，但词意相属，如出诸己，可见其吐属风流，记颂之博。梁氏词功很深，但晚年反而不大作了。彼一时，此一时也。著名教授兼权威学者梁启超，此时讲学、写文章虽偶尔也提及“革命”，但不过说自归说、做自归做罢了。这使我们想起他的另一件事。

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到武昌讲学期间，拜访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有意诘难梁启超，便出上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略思片刻，从容对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联中所说的“四水”指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四时”为春、夏、秋、冬；“江夏”是武

昌的古称；“三教”指儒、道、释；“三才”系天、地、人；“儒人”即儒生、学者。上联盛气凌人，问得刁钻；下联不亢不卑，答得巧妙。上下联属对工整，暗藏机锋，一时传为佳话。张之洞年长梁启超 36 岁，又是清廷重臣、社会名流，对这位“后生小子”未免白眼相加，但想不到在问难与应对中二人竟打了个平手！他自然知道，由于双方地位、名望、年龄之悬殊，即使打成平手，梁启超也是赢家。

到此为止，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已画上了句号。但这究竟是他的起点，还是终点？抑或两者都是，也都不是？实在是一个说不清、也说不尽的话题。惟因如此，亦正因如此，梁启超对后世具有永久的魅力。

四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选了梁启超的两本书：一本诗话，一本书话。

“饮冰室”为梁启超书斋名，典出《庄子·人间世》。语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清代学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将这句话疏解为：“诸梁（楚庄王之玄孙尹成子，名诸梁，字子高——笔者按）晨朝受诏，暮夕饮冰，足明怖惧忧愁，内心熏灼。询道情切，达照此怀也。”梁启超即以此自命。他在《饮冰室自由书·叙言》中谈到此书写作经过时说：“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友倾吐之，过而辄忘。无涯生曰：盍最而记之？自惟东鳞西爪，竹头木屑，记之无补于天下。虽然，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也。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

例，无宗旨，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以名吾室。”于是，饮冰室主人便大行于时，名满天下。

《饮冰室诗话》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时的著作，最初连载于1902年至1907年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半月刊，计204则。广智书局1905年6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诗话收录至1905年初。中华书局1925年版《饮冰室文集》和1932年版《饮冰室全集》，诗话则收录至1905年底，共174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饮冰室诗话》单行本，以广智书局和中华书局的两个本子为据，只收录了1905年以前发表的174则诗话，而《新民丛报》1906、1907年发表的另外30则诗话则仍未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7辑作为“资料”发表了后30则诗话，题为《饮冰室诗话拾遗》。说明前此出版的各种《饮冰室诗话》，皆非足本。

我们这次重新编选的《饮冰室诗话》分正文204则；补编有《情圣杜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屈原研究》、《饮冰室评词》、《论荆公诗词》、《诗界革命的三点主张》；附录部分收录了梁启超的诗词和他的集宋词联语《苦痛中的小玩意儿》等。新编足本《饮冰室诗话》将梁启超诗论和诗作合为一集，是一个较完备的版本，当然也是一种尝试。这或可为阅读梁启超和研究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提供一些方便。

关于“书话”一体，晦庵（唐弢）在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书话·序》中说：“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

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如果说晦庵《书话》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以版本源流、掌故资料为主，那么梁启超撰写的书话则既有“内容的评论，”也有“掌故的追忆”。前者如要籍解题与释义，后者如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饮冰室书话》以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为底本，经过认真筛选、梳理、分类，共得五编：

第一编，要籍解题与释义；

第二编，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第三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第四编，序、跋、题记；

第五编，学与术。

各编内容如题目所示，无须重复。需要说明的是，《饮冰室书话》除了着眼于“书”本身的知识和评论外，还辑录了梁氏有关读书与治学的部分论述。对此，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书话”也可以说是“话书”，因此很难将谈书、读书与治学截然分开，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类似书话这样的学术论著，既要满足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收藏之用，又要尽可能照顾到普通读者的读书、求知需要。梁启超在读书与治学方面有许多精彩论述，很值得重视。如《治国学杂话》一文写道，“一个人要养成读书趣味”，“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他认为，读书如“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它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大有功用。……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在所有读书方法中，他特别推崇“抄读法”，认为“好记性的人不见

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因此，“抄录或笔记”是极为必要的。《学与术》一文，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学”与“术”分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最完整、最明晰的诠释。梁启超进而认为，“我国之弊，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膠柱以用诸他事。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帖括之学，白首矻矻，而丝毫不能为世用也；离学言术，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这些论述看似与书话不类，但以广义书话而论，实则是提升了书话的品位。

梁启超已矣。《饮冰室诗话》、《饮冰室书话》连同这位饮冰室主人的其他优秀著作，明显带有他那个时代的印记。其中有些提法、观点、事实、内容，以及有的知识和学术话语，不仅和现代不同，而且相左。但是，对历史著述只能历史地看待。列宁有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一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管对政治家梁启超，还是对学问家梁启超，都是同样适用的。

记于1997年春，新雨初霁之后。

目 录

第一编 要籍解题与释义

读《春秋》界说	(1)
读《孟子》界说	(13)
读《墨经》余记	(19)
附录：复胡适之书	(30)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34)
清代学者整理之古籍(节录)	(54)
辑佚书	(54)
史学	(64)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94)
自序	(94)
《论语》、《孟子》	
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	(97)
《史记》	(108)
《荀子》	(129)

2 饮冰室书话

《韩非子》	(143)
《左传》、《国语》	(148)
《诗经》	(156)
《楚辞》	(169)
《礼记》、《大戴礼记》		
附论《尔雅》	(178)
《庄子·天下篇》释义	(195)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	(225)
《韩非子·显学篇》释义	(236)
《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	(239)
《淮南子要略》书后	(241)
马司谈《论六家要指》书后	(244)
《荀子·正名篇》	(248)

第二编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253)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253)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259)
韵文书类	(264)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266)
随意涉览书类	(266)
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270)
附录二：治国学杂话	(270)
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275)
学要十五则	(279)
最初应读之书	(284)